

谁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

杨 军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是各种因素聚合在一起的结果。无论阿拉伯国家还是以以色列都不曾期待这场战争, 尤其是叙利亚与埃及, 虽然是它们的种种行动最终导致了战争。

关键词: 第三次中东战争; 阿以冲突; 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

中图分类号: K38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07)02-0127-05

第三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历史的一次转折点, 从 1967 年 6 月 5 日早晨以色列对埃及空军的突然袭击开始, 至 6 月 10 日以它对埃及、叙利亚、约旦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战争的结果改善了以色列的安全态势, 极大地鼓舞了以色列人和全世界犹太人的士气; 由于占领了大片阿拉伯领土, 以色列的国家形象也发生了变化, 其国防军开始扮演令阿拉伯人憎恨的占领军角色。然而, 令人惊奇的是, 这是一场无人期望的战争。在冲突的双方中, 挑起战前危机的阿拉伯一方虽然将以色列一步步逼向战场, 但它们的计划并不包括战争, 而且始终将不打第一枪作为自己的原则; 以色列虽然是首先发起攻击的一方, 但它只是被迫对阿拉伯的进逼做出反应, 并且只是在一切外交努力均告失败的情况下才发动战争的。

我们将导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危机划分为三个时期, 分别以叙利亚、埃及和以色列为中心, 三个时期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一、叙利亚的强硬态度

就第三次中东战争而言, 叙利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法塔赫恐怖袭击的支持将自己置于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境地, 又通过埃叙间的共同防务协定和苏联的介入将埃及引向五月危机。

在五月危机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叙利亚是对以色列态度最强硬的阿拉伯国家。敌视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中是普遍的, 而叙利亚异乎寻常的激烈态度还有其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1966 年 2 月, 萨拉哈·贾迪德将军发动军事政变, 接管了叙利亚的统治权。在叙利亚, 贾迪德将军和他的亲密同事空军司令阿萨德将军等担任要职的人员都属于少数阿拉维派, 他们感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就应该表现得更加激进, 更加民族主义化。因而, 叙利亚政府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法塔赫组织对以色列发起一次又一次恐怖袭击, 将对以色列的仇恨作为他们忠于阿拉伯人民事业的证据。^[1]这与埃及的谨慎立场大相径庭。1966 年 7 月, 叙利亚政府将法塔赫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不仅在人员征召、武器装备、资金、训练等方面予以协助, 而且亲自参与策划恐怖袭击。7 月以后, 恐怖活动猛然加剧, 多次造成以色列人员伤亡和生活及国家工程设施的毁坏, 叙以关系一度极为紧张, 以色列扬言对支持恐怖袭击的国家进行报复。虽然叙利亚乐意显示对阿拉伯国家的敌人的仇恨和行动的决心, 但它完全清楚自己远不足以对抗以色列的军事机器。到了 11

收稿日期: 2006-07-06

作者简介: 杨 军(1970-), 男, 河南驻马店人,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月,以色列的忍耐似乎到了极限,各种迹象表明以色列准备对叙利亚的城市乃至首都实施报复性打击。叙利亚人紧张起来,开始谋求埃及的援助。

虽然纳赛尔总统不赞成叙利亚人支持恐怖袭击的政策,他却无法拒绝他们的求援。作为阿拉伯国家的盟主——当然有人对此提出挑战,但它的确是纳赛尔追求的目标——埃及不可能在阿以战争中置身事外。无论纳赛尔是否响应叙利亚的求援,叙以间的战争肯定会把埃及也拖进来。11月4日,埃叙缔结共同防务协定,规定在一方受到以色列攻击时,另一国家必须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以帮助对方。^[2]它并不意味着埃及开始赞同叙利亚的冒险,相反,纳赛尔希望借此能增加一些对叙利亚的约束力,他将放弃支持恐怖袭击的立场作为签约的条件,叙利亚不得不对此作出保证。

共同防务协定对叙利亚的约束力很值得怀疑。1967年的春季,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多次发现来自叙利亚的人员埋设的地雷,并有人、车辆因此受损。“一月,沿戈兰高地的边境冲突迅速升级,出现了坦克与火炮的交火。整个春季一直持续着这种紧张的气氛。”^[3]4月7日,叙利亚炮击在以色列一方耕作的拖拉机,以色列出动空军炸哑了叙方大炮,随之而来的空战中以色列击落六架叙利亚米格-21。空战的结果仍不足以使叙利亚人改变主意,事实上,从4月下旬到5月下旬,越过边境的袭击事件反而增加了,无论是埃及人的请求还是苏联大使的警告都无济于事。叙以边境局势日趋紧张,袭击事件引起以色列人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警告。

1964年以后,苏联开始向叙利亚提供援助,这虽然晚于对埃及的援助,但由于叙利亚在意识形态方面较埃及更接近于苏联,苏叙关系反而较苏埃关系更为深入。1967年起,叙利亚的学校开设了俄语课,两国签定的文化协定还规定将苏联使用的某些课本译成阿拉伯语直接提供叙利亚学校使用。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将叙利亚的成功看作自己的成功、把叙利亚的失败看作自己的失败,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苏联了解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决不希望看到一场叙利亚必输无疑的战争,而这场战争似乎正在迫近。苏联人双管齐下:一方面警告以色列不要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也试图让叙利亚人收敛一些。如果能使叙利亚人相信以色列的进攻迫在眉睫,他们也许会放弃支持恐怖袭击的立场。5月10日前后,苏联分别向叙利亚和埃及通报了所谓以色列部队在以叙边境集结、准备进攻叙利亚的情报。这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假情报”或“苏联谎言”。以色列学者米歇尔·巴尔-佐阿尔认为苏联此举有两个目的:(1)敦促埃及采取行动,以帮助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另一个朋友;(2)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政策。为抵制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制造多处紧张局势的策源地,让东西方之间摆出武力对抗的姿态”。^[4](P135)]美国学者乔恩·金奇等则强调了恐吓叙利亚人的动机和借助埃及劝阻叙利亚采取恐怖战术的目的。^[5](P306)]苏联希望中东出现紧张局势,其实不是从苏联谎言开始的,而且在苏联谎言出现之前,叙以局势已非常紧张,近乎一触即发。考虑到密切的苏叙关系和叙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苏联所期待的决不会是战争。也许将苏联谎言看作试图缓和局势的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更为符合实际。^[6]

无论苏联谎言的动机是什么,它一旦出现便直接促使埃及根据埃叙防务协定增兵西奈半岛,成为一步步升级的五月危机的第一推动力。一旦埃及决定增兵,纳赛尔便跨出了走向战争的第一步。从增兵西奈开始,到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封锁蒂朗海峡,约旦宣布将军队置于埃及的控制之下,伊拉克军队进驻约旦,直到战争爆发,这些事件的发生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环扣一环,最终出现了苏联所不愿看到的结果:接受苏联援助、使用苏联武器的埃及和叙利亚惨败于以色列,使得苏联大丢脸面,在阿拉伯世界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

以苏联谎言的出现为中介,叙利亚将战前危机中的第一主角角色传给了埃及。

二、埃及的步步进逼

随着危机的中心从叙利亚转到埃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另一个重要的转变,那就是埃及对阿以关系的立场。此前,埃及不希望阿以间出现紧张局势;等到埃及开始根据苏联的情报和埃叙防务协定采取相应的行动时——这些行动与叙利亚所支持的法塔赫的小打小闹不在一个水平级上——它的立场也由竭力避免紧张局势转为主动寻求紧张局势,甚至期待着危机的出现和加深。

埃及在五月危机前关于阿以关系的立场建立在一个清醒的认识基础上：那就是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埃及）与以色列在军事方面的差距。在弥补这种差距之前，阿拉伯国家无力以军事手段改变以色列存在的事实，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阿拉伯国家不应该在阿以间制造紧张局势，相反，应努力避免这种局面出现。^{[7](P149)}第二次中东战争以来，这一直是纳赛尔总统奉行的政策。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埃及不允许巴勒斯坦人从己方的边境出发，攻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以免招致以色列对埃及的报复性打击。

1967年5月12日，苏联驻开罗大使向埃及传递以色列军队在北部边境集结，准备进攻叙利亚的假情报，并建议埃及采取必要的措施。^{[4](P1)}这以后，埃及抛弃了奉行多年的克制政策，走上了通向战争之路。

如果说苏联假情报是导火索，那么炸药则应到埃及内部去找。事实上，纳赛尔并不深信所谓以色列集结军队的情报。“联合国停战委员会、埃及情报总署和埃军参谋长穆罕穆德·法齐所做的调查均否认此事。”^[8]尽管如此，纳赛尔还是决定放弃他一直坚持的谨慎立场，增兵西奈半岛，以威胁以色列南翼的方式牵制它可能发动的对叙利亚的攻击。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根源仍在于阿以冲突，而埃及之所以迈出第一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当时埃及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国内人民的不满需要平息，而挑起阿以争端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2）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宣传机构不断地嘲弄埃及躲在联合国紧急部队背后，强烈地刺激着以阿拉伯领袖自居的纳赛尔；（3）苏联情报不仅仅是向埃及传递一个信息，它还是一种委婉的压力。由于接受了苏联大量的军援和经援，埃及难以拒绝苏联要其采取行动的请求。^[9]在这三个因素的基础上，苏联谎言成为“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令纳赛尔改变了尽量避免紧张局势的立场，于5月14日向西奈半岛增兵两个师。

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从这里出发，局势的发展不仅完全违背了纳赛尔的意愿，而且还在五月危机的后期改变了纳赛尔一直保持的清醒判断，错误地以为自己已有能力与以色列进行一场战场上的较量。当然，这种形势判断上的变化是逐渐进行的，从纳赛尔的行动中不仅可以找出改变的轨迹，而且能够觉察到直到最后他仍保留着的危机前所作判断的一丝残余。从五月危机到战争爆发前夕，纳赛尔从来没有主动发起战争的想法，他至多不过是期待着以色列打第一枪，他设想的最好结局则是不战而胜。^[10]

在推动埃及一步步地使五月危机升级的诸多因素中，约旦的敌对宣传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埃叙防务协定签定以后，纳赛尔与叙利亚靠近，站到了阿拉伯“革命派”行列中，而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则被称为“反革命派”。以色列是两派共同的敌人，但两派也相互为敌，互相攻击对方反以不力。^{[7](P148)}

约旦显然认定纳赛尔不打算同以色列开战，它也清楚如埃及与以色列发生战争，约旦必将被拖入。可悲的是，安曼电台的嘲弄的确对五月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埃及虽然增加了驻西奈的军队，但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驻扎着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躲在它后面算什么英雄？约旦电台仍未停止它的嘲弄。^[11]

纳赛尔虽不想打仗，但他得作出准备战争的姿态。5月16日，埃及通知联合国紧急部队，要求它从西奈半岛撤离。到5月19日，埃军接管了包括蒂朗海峡的门户沙姆沙伊赫在内的所有联合国紧急部队哨所，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再无障碍，蒂朗海峡已处在埃及的控制之下。就在这一天，安曼电台声称：“逻辑、智慧和民族主义都认为埃及负有封锁蒂朗海峡的义务……”^[12]

一旦埃及接管了沙姆沙伊赫，它又如何能够允许以色列船只自己的眼皮下进进出出呢？纳赛尔的荣誉感决不允许他这样做，阿拉伯人也不会答应。另一方面，纳赛尔很清楚封锁蒂朗海峡的危险性，那将违背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联合国及美、英等大国对自由通航的保证，而以色列早就宣布封锁海峡是战争行为。

从5月14日增兵西奈半岛到5月19日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纳赛尔有效地使他的对手降低了调门。约旦虽然仍在挑逗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辱骂声已听不见了。而那些支持他的人们则响起一片欢呼声。短短的几天里，纳赛尔重新树立起阿拉伯领袖形象。他很清楚，如果他在占领沙姆沙伊赫后仍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他在过去几天所赢得的全部声誉将会一扫而空。阿拉伯世界的‘反动派’将会毫不留情地利用他的弱点，甚至他在大马士革和阿尔及尔的盟友也可能会幸灾乐祸”。^{[5](P288)}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在非理性的荣誉感面前，原来的清醒判断渐渐变得模糊，国家利益的原则发生了扭曲。

然而，封锁蒂朗海峡意味着同以色列的战争，纳赛尔不得不三思而行。从占领沙姆沙伊赫到5月22日宣布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三天的间隔正反应了纳赛尔犹豫不决的心情。问题在于此时事态

已不再按照纳赛尔的意图发展,相反,他得根据事态的发展采取行动。赶走联合国部队后,他已没有退路,封锁蒂朗海峡是必然的,纵然这与他曾经作出的判断不符。

封锁蒂朗海峡不久,纳赛尔在各种公开场合露面,不断地向以色列发出挑战,调门越来越高,完全抛弃了几个星期前所持的谨慎立场。集结在西奈的“数以百计的坦克和飞机,成千上万的士兵,大国的举棋不定,苏联的支持,法国的亲阿拉伯立场,所有这一切,使他丧失了全部判断力”。^{[4](P135)} 5月26日,他在对阿拉伯工会会员讲话时,明确表示接管沙姆沙伊赫意味着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对抗,而埃及的“基本目标将是摧毁以色列”。两天后在开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纳赛尔声称决不允许以色列船只使用蒂朗海峡,“如果以色列选择战争,那么它将受到欢迎”。5月29日,在对国民议会会员讲话时又谈到了恢复1848年态势的问题。^{[13](P400-401)} 这些讲话受到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纳赛尔恢复了他在阿拉伯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反过来这又鼓励他在狂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纳赛尔的冒险给那些反对他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约旦、沙特阿拉伯、突尼斯等国不得不改变敌视埃及的立场,加入到纳赛尔的行列之中。封锁海峡的消息令约旦侯赛因国王大为震惊,他开始相信纳赛尔这次要动真格的。30日,侯赛因国王飞抵开罗,与埃及签定了类似于埃叙共同防务协定的条约,规定战时约旦军队将受埃及将领指挥,并同意伊拉克军队进入约旦境内。

三、以色列的态度转变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处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状态之中,在北、东、南和西南方向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除了边境地带小规模恐怖袭击和报复行动外,以阿之间相对平静。以色列对双方态势的基本估计是,北部、东部的黎巴嫩和约旦较为弱小,东北部接壤的叙利亚虽然对以政策强硬,但不足以单独发动战争,如无埃及的参与,以阿之间只能维持“冷战”局面,不可能爆发战争。而埃及一方面判断它军事实力与以色列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另一方面,自1962年起纳赛尔插手也门内战,到1967年五月危机前仍有5万军队陷于也门。因此以色列认为:(1)1970年以前埃及不会发动战争;(2)埃及发动战争的前提是从也门脱身。^{[5](P322)}

以方的判断乃是基于对以埃军事实力的客观分析,但忽略了在特定时刻可能主导形势发展的某些非理性因素。纳赛尔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促成阿拉伯世界的团结,重振阿拉伯雄风。对此目标而言,以色列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障碍。^{[13](P363)}

由于先入为主地认定埃及不会发动战争,对程度不断加深的五月危机,以色列的反应完全是被动的。在这一段时间里,以色列政府犹豫不决,一面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一面又幻想着借助大国的斡旋解决危机。在以色列最终定下开战决心的过程中,有两个事件起了关键的作用,这就是封锁蒂朗海峡和埃约防务协定的签定。

以色列是否具有蒂朗海峡的自由通航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但在阿以双方交恶的局面下,它上升为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是英、法、以三国共同策划的,而以以色列参战的目的之一便是打破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14] 战后的安排中包括了联合国对以色列航运权的保证。埃及虽然不承认以色列有此权利,但纳赛尔同意联合国紧急部队驻在沙姆沙伊赫,实际上是默认了以色列使用海峡的事实。

从以色列一方来看,在1957年从西奈半岛(包括沙姆沙伊赫)撤军时,以色列即宣布它将封锁蒂朗海峡视为交战行为,并多次申明这一立场。五月危机中,对埃及增兵西奈半岛和驱逐联合国紧急部队,以色列只是作了预防性的军事部署,但在纳赛尔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后,军方制订了于25日晨对埃及开战的计划,准备在外交努力失败后以军事手段打破埃及的封锁。

纳赛尔封锁海峡的决定震动了世界。联合国、英国、美国等分别对此表示谴责。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也不赞同埃及的这一决定,埃及走过头了,苏联很清楚封锁海峡意味着什么。5月24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如果阿拉伯国家受到攻击,苏联将支持他们;“但是他们也直接通知纳赛尔,并在他们公开的声明中含蓄地表示,他们不支持阿拉伯国家扬言要进行的那种反以色列的圣战。”^[15]

事态还在继续发展。埃及源源不断地向西奈增兵,5月25日,埃及精锐的装甲第4师进驻西奈半岛,

在西奈埃及军队已达 10 万人, 坦克 800 辆, 这样一支部队已足以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叙利亚正在调动部队到南部前线; 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开始实行战时编制, 并下达了不同级别的动员令。科威特一个装甲旅的先遣部队已空运到埃及, 准备与埃及并肩作战。蒂朗海峡渐渐不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以色列感受到了受攻击的威胁。由于国土狭窄, 几乎没有防御纵深, 以色列难以承受对方发动战争的后果, 军方一直奉行一种“预防性战争”的战略, 即保持战争的主动权, 在形势危急的时刻, 主动遂行先发制人的进攻。这一战略的弱点在于它需承担部分的战争责任, 甚至会被一些国家看作是侵略者, 虽然最初挑起紧张局势的可能是阿拉伯一方。这也是以色列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

5 月 28 日, 以色列内阁对局势进行了讨论, 18 名部长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派, 最后表决的结果是 9: 9, 赞成与反对战争的各为一半, 无法作出决定。军方已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 深恐会随着阿拉伯军队的集结而失去战机。在约旦国王于 30 日与埃及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 以色列军方对政府的不满更为强烈, 而危机感早已弥漫于全国上下, 艾希科尔总理被迫成立民族联合政府, 吸收反对党人士入阁。这标志着主战派的胜利。达扬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第二天, 他与军事将领们重新审查了作战计划。秘密访问美国的情报部门首脑阿米特回到以色列, 带回美国默许开战的信息。^{[5] (P314)} 以色列已决心一战, 唯一的问题在于开战的时机。这以后的两天, 以色列大放烟幕, 表示不会走向战争, 被五月危机吸引来的外国记者纷纷准备回国。纳赛尔相信自己的冒险终于成功了。6 月 4 日, 美国组织国际海军舰队打破蒂朗海峡封锁的计划终告夭折, 以色列内阁授予总理和国防部长必要时命令部队采取行动的权力。第二天,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结 语

综观导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诸多因素, 叙利亚和埃及对战前紧张局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它们的行动针对的是以色列, 起因及促使事态发展的动因却更多地源于阿拉伯世界内部, 而目标也不是与以色列的战争。苏联的假情报直接将埃及推入五月危机, 但其初衷却是制止叙利亚所支持的恐怖袭击, 以缓和叙之间的紧张局势。以色列不想与阿拉伯国家发生战争, 但后者的行动没有给它留下回旋余地。叙利亚、埃及和苏联共同制造了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局面, 它胁裹着它的制造者与其目标背道而驰, 最终指向了战争。

参考文献:

[1] Don Perez. The Middle East Today[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8. 421.
[2] 理查德·艾伦.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454.
[3] Charles D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M]. New York: ST. Marlin’ s Press, 1992.
[4] 米歇尔·巴尔佐阿尔. 六日战争秘史[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5] 乔恩·金奇, 戴维·金奇, 等. 中东战争(上册)[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6] Golia Gol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June 1967 Six Day War[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6, (Winter): 3 19.
[7] Ian Bickerton, Carla Klausner.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M]. New Jersey, USA: Prentice Hall, Inc. 1991.
[8] 杨灏城, 江淳. 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15.
[9] Howard Sachar.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772 773.
[10] Deborah J Gemer. One Land, Two People[M]. Colorado, USA: Westview Press, 1991. 71.
[11] 阿兰·哈特. 阿拉法特传[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22.
[12] 彼得·斯诺. 侯赛因[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193.
[13] 罗伯特·斯蒂文斯. 纳赛尔传[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14] 田上四郎. 中东战争全史[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82.
[15] 沃尔特·拉克. 争夺中东, 1958—1968 年苏联和中东的关系[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Who Launched the Third Middle East War?

YANG J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Middle East War involved various factors. Either Israel or the Arabian countries didn’ t expect the war, especially Egypt and Syria, although it was their improper actions that finally resulted in the eruption.

Key words: the Third Middle East War;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 Israel; the Arab countries

(责任编辑: 洪 彬)